

“不隔”之说原意究竟何在？

——从姜夔词看《人间词话》的“不隔”之说

曾 钻

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是以“境界”说为其理论基础的。从“境界”说派生出来的“不隔”之说，是静安先生衡量词作的一条艺术标准。两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认为只有“不隔”才能有“境界”，“隔”就无所谓“境界”了。就“隔”与“不隔”之别，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这样说过：

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青，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单楼吟》“此池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被清愁，花销英气”则隔矣。

对于“隔”与“不隔”的区别，静安先生并未在这里明确地下定义，他只是说了“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其余的竟都通过实例的比较来立论，是通过作者的直观来探求这种蕴藏在诗词中的艺术“境界”的。这就给后人的理解留下了一种虚幻的余地。为此，“不隔”之说多年来歧解迭出而运用甚少，其中华裔加拿大大学者叶嘉莹提出的“真切”之说在近年来的词学教学与科研中得到了较多的采用。本文仅仅对“真切”作一分析，并试图引用

“真切”一词提出自己对“不隔”之说的一些理解，加入歧解之林。

“真切”说出自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如果在一篇作品中，作者果然有真切之感受，且能做真切之表达，使读者亦可获致同样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不隔”。反之，如果作者根本没有真切之感受，或有真切之感受但不能予以真切之表达，而只是因袭陈言或雕饰造作，使读者不能获致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隔”。

叶氏的诠释浅近明快。但是“真切”本身的标准又何在呢？作者对所写事物的感受达到何种程度才算“真切”？

因此，“真切”有一个“程度”问题。作者在对某一事物进行描述时（其间带有作者自身的感受）首先就在于对这一事物作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只有这样才能将作者对“现实的感受”^①传达给读者。而这种传达的准确度越高，则读者的“可能的感觉”^②也就越接近真实，读者的感受与作者的感受也就更为一致，这样才能达到最大程度上的“真切”。如是才是真正的“不隔”。王静安先生也曾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可见，“境界”之有无，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真伪，而“境界”的深浅（“真切”度的高低）则是作品成就高低的根本标准。然而，即便如此，是不是所有能确实而毫不含糊（按通常词典中对“真切”之释义）

①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心灵论》。

地传达了作者其时其地的真情实感的作品，就可算是最大程度上的“真切”，就可称之为“不隔”了。这里，我们如果对《人间词话》中被静安先生评为是“隔”的姜白石的部份作品作一些分析，便可得出结论是：并非如此。

姜白石的名作《扬州慢·淮左名都》曾被静安先生评为“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词中表现的是金兵两度南侵，扬州城再次受到破坏后的残败景象，其中透露出词人沉痛的心情：昔日的“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如今举目四望“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满目萧然。这一实景的描述反映出词人此时此刻起伏不平的心潮，词人痛心于胡人南侵后，将昔日的名城破坏殆尽，“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而这空城中的黄昏清角则更令人悲凉、惊心。感情于此更加深一层。“都在空城”中的一个“空”字“化景物为情思。”下片词人用杜牧的诗意虚笔勾勒，通过对昔日繁华的回忆，更衬托出如今波荡月冷的萧条景象，包含着深沉的家国兴亡之感。“废池”“清角”“空城”“波荡”“冷月”构成了一幅令人触目伤情的水墨丹青画。其中渗透着词人对金兵南侵的愤慨，对宋王朝偏安江左，致使大好河山被断送的痛心；对这种空虚的边防的忧虑。在这一幅完美的艺术画面中，传达出词人深厚的爱国情感。这种爱国的歌声虽不如辛词那样热情洋溢，然其感受之“真切”却是无疑的。当时的词人萧清藻称之为有“黍离之悲”，而千百年后的我们仍然为之感动。尤其是被静安先生评为“有隔雾看花”之感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句，不仅来源于“真切”的感受，且作了“真切”的表达。脍炙人口的“波心荡，冷月无声”不仅表达了词人感受到的“月”的声、色。甚至还有别人不易感受到的“月”的“温度”，一个“冷”字充分表达了词人的心灵感受，至使我们今天才具平平的人也能领略到这样独特精微的情感。这种传形传神的表达，其“真切”是显而易见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按通常的“真切”之意去理解，那么象这样的“真切”之作理应是属“不隔”的，而这恰与静安先生的结论相背。

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切”之意与静安先生的“不隔”是有区别的。那么，“不隔”之说本意究竟何在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人间词话》的本身来探讨。

首先，就作者的感受与表达来看，确如叶嘉莹所说，静安先生反对毫无“真情”的字面上的“雕饰造作”，他在《人间词话》中曾这样谈道：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唯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讯也。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贬斥之篇，不使柔靡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从王论中可以看出，这些“雕饰”均属无病呻吟的词藻堆积。姜夔的《疏影》便明显地带有这类缺点。词中用了一连串的“深宫旧事，”“安排金属”等典故，而这些各不相属的典故无非只是为了多方面地来表现梅花，并无多少“真情”可言，而且也未必有什么明确固定的寄托。这样的词当然只能是“无一语道着”（《人间词话》）了。

相比之下，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同样用典较多，但其间所融注的却是词人的一片忠愤之情。面对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词人热情地赞颂了孙仲谋、刘裕的业绩，追忆了宋文帝北伐失败之史事，表现了词人痛惜南宋半壁江山沦亡，告诫北伐的韩侂胄切勿草率从事，轻敌冒进的拳拳之心，痛切之情溢于言外。象这样悲壮的歌声可说是宋词中所放出的最后一次光芒。无怪乎静安先生把他的词赞为“佳作”，以其为“有性情”，“有境界”。

不仅抒情之作须有“真性情”，且咏物之作亦须如此，要“能与花鸟共忧乐”（《人间词话》）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有这样一段评论：“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一个“闹”字写出了春天的气氛，表现出作者在春天所感到的那种孩子般的欢乐心情。一个“弄”字则体现出作者在“花”身上所看到，所感到的一种娇

羞的情态,这些都是作者一种“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这样的作品才能是“不隔”的。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这种“纯真性情”的流露看作是达到了最大程度上的“真切”表达。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看一段《人间词话》中静安先生对李煜的一段评价: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篇。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这种“赤子之心”是一颗丝毫不受尘世侵染的,纯真无瑕的而又带有一些“天真”的“童心”。静安先生所要求所强调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真性情”。词中有这样的“真情”,才能是有“境界”才能“不隔”。这里的“真”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相对于伪、假而言的、“真切”的“真”是有着不容忽略的差别的。它不只是要求“真实”,而

更要求“纯真”。

在南宋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姜白石作为一个被压抑在社会下层的文人,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和独立的人格。他也有象荷、象梅那样的品格和气节。但这并非是一颗“童心”,而是一颗看破红尘,饱经生活艰辛的词人之心。他只有“仗酒被清愁,花销英气”来作为他排遣精神苦闷的唯一方法。这正是白石的有些词作虽然包含着词人当时的真情实意,且做了真实的表达,但却被静安先生认为是“隔”的原因所在。

“真”贯穿于《人间词话》的始终。然而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静安先生所要求的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真实的感受和表达,还要求词人性格上的“天真”,词作表现手法上的“天成”,唯此才是真正的“不隔”。静安先生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曾说过:“何以谓之有意?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如真口出是也”。

即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方可谓之有“境界”如是才算“不隔”。而任何矫饰妆束都会导致“失真”,而无“境界”,这样的词作便是“隔”。所以,我认为就“不隔”来看,唯其“纯真”才是达到了最大程度上的“真切”。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披着宗教外衣的原因

张哲颖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这是由英国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本文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

十六世纪下半叶,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全国“约有400万人口,其中有4/5的居民住在农村。”^①革命前英国的农村经济生活基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生产力有很大提高。沼泽的疏干,土壤的改良,草田轮作制的实行,新农具犁、播种器的使用和农艺书籍的广泛流行,使农业收入迅速增加。高额的收入吸引了不少富人来到农村,他们力图成为新式的庄园主和农场主。原有的中小贵族也开始采用资产阶级经营方式。“无怪英国在十六世纪末,会有一个在当时情况下已经算很富有的资本租地农业家阶级了。”^②其次,到十七世

纪初,圈地运动的普遍进行,使封建的农业经济迅速地过渡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那些土地被暴力剥夺,被驱赶出来的农民,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必不可少的自由劳动力。

工业方面,各部门都有了新的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在采煤业中,由于矿井排水空气泵的使用,产量有较大提高,“占欧洲总产量的4/5”^③。在炼铁业中,由于鼓风机的改良,十七世纪已有800座平均每周生产3—4吨铁的炉子^④,羊毛加工业在全国普遍流行,并从“羊毛输出国变成了对外供应毛织品的国家”^④。“各种新的生产部门,如棉织、

^①施脱克马尔《十六世纪英国简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期。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1页。

^{③④}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五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12页。